

臺灣宿命文化與民間信仰

莊萬壽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座教授

一 臺灣的倒退

臺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由威權過渡到民主，李登輝總統推動的政治改革，被稱譽為「寧靜革命」，比起也稱「寧靜革命」的印度甘地、蘇聯的戈巴契夫，臺灣可說更是「寧靜」，然而印度新國家出現了，蘇聯大帝國與共黨瓦解了。臺灣呢？差得遠。臺灣人民只可直選總統只使臺灣有希望而亡。但就習慣於長期被殖民的臺灣人的政治冷感性格言，臺灣真的跨越出艱難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臺灣島處於東亞海洋的要衝，閩客人又善於航海交易。經濟文化發展早就超越東亞大陸。戰後，朝鮮兵興，國黨政府與美日同一陣營，經濟與全球的步伐同步發展。人口遽增，□□是世界的最前列，但人民大多尚能溫飽。

進入了二十一世紀，臺灣民主政治也啟開了新的門扉，露出臺灣人一線的尊嚴與希望。然而中國的政經崛起，在主客觀的因素下，臺灣的資金、人才大量的流入中國，牢牢被吸住。造成對臺灣經濟與社會巨大的

衝擊。政治菁英之急功近利，缺乏智慧，沒有遠見。而臺灣人民又多隨波逐流，感情用事。使臺灣又深陷危機。

此刻，臺灣都會一片歌舞昇平的歡笑之餘，又有多少悲傷的故事，暴露人間的角落？臺灣又倒退了。韓國一百多年來與臺灣有近似的命運，甚至更悲慘。他們國家會有主權，是人民有做主人的勇氣，終於屹立於世界，將臺灣拋在後面。臺灣終極的前程，不單賴政治、經濟，最重要的莫過於文化與性格的改造，個人已有不少的論述。以下文字係就當下臺灣社會離亂現狀，商業包裝的宗教活動，來探討臺灣人的宿命觀。宿命已經內化，我稱之「宿命文化」。

二 臺灣人何以不生、要死、不快樂？

臺灣物質文明，隨全球化而高度的發展，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名車、豪宅，也有為中產，普羅大眾服務的公共設施，和起碼的保健制度。這是全球中度開發以上國家的社會普遍現象。而且同樣受到科技快速躍進對社會變遷

的影響，如電子通訊器材會改變人際關係與政商情勢。臺灣社會對這些現象有同樣的進程，然而臺灣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近幾年，各種重要的人民生活的指標，打破了世界記，嚴重的威脅臺灣的生存，國家的安全茲分述如下：

（一）不生——生育率全球第一低

臺灣在二〇〇〇年出生嬰兒有30.5萬人，到二〇一〇年驟降至16.7萬人。十年內我臺出生率幾乎減少一半，每一婦生育低於一人，皆創世界第一（內政部資料），這是非戰爭時代的人類奇蹟。

（二）要死——自殺率創新高

臺灣自殺防治學會的報告，一九九九年臺灣每十萬人自殺10.36人，而到二〇〇九年升至17.6人（世界平均值15人）而自殺通報數由兩萬兩千六百六十四人增加為兩萬五千六百四十九人。有資料顯示：臺灣自殺率是世界第二，有的稱是十餘名。總之是極嚴重的。

（三）不快樂——痛苦指數攀升

痛苦指數（misery index）是經濟學科學統計數據，二〇〇八年前為五。二〇一〇升為6.2，中研院院士認為二〇一一，又將超過（胡勝正），另外，香港調查東亞七國人民的快樂指數（Well being index），二〇〇九年新加坡第一，臺灣最後一名，只有30.6%人快樂，不快樂的主因是怕丟飯碗，即失業是臺灣人的最痛苦。

生育率最低，不願生後代，而且自殺，或自殺未遂，當然是一個痛苦的社會，不快樂的

社會。臺灣已非獨裁、專制的國家，也不是民不聊生的社會，尤其臺灣有傳統儒教「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和佛教自殺下「枉死地獄」、「不得超生」的信仰價值，臺灣居然要成為「不生、要死」「痛不欲生」的人間煉獄嗎？

三 臺灣的宿命文化

要尋找「不生、要死不快樂」的原因，從香港調查的資料是失業的經濟因素。不可否認，從工廠資金外流，失業與通膨的數據就節節上漲。二〇一一年一月失業率仍高達5.68%，（主計處）但這是包含許多政府用預算雇用的短期臨時工——假就業人口），青年世代失業率高達十五%（天下），最嚴重的是貧富懸殊。以十等分計貧富差距二〇〇六年為24.22倍，二〇〇九年28.36倍（財政部）。以五等份計，二〇一〇年20%。一百五十六萬戶人，生活入不敷出。（主計處）臺灣GDP，國民所得未減但資本家在政府的庇蔭下，富可敵國。財富都落入資本家之手。

平心而論，臺灣財富兩極化，每況愈下，但中國與香港何嘗不是如此？當然中國內部會生變，自不待言，但臺灣的痛苦的原因，另有其他值得觀察的現象與意涵。

首先，在邇來「痛不欲生」「入不敷出」的社會犯罪率一定增加，尤其是偷搶的犯罪。貪起盜心，理所當然。但臺灣犯罪率近年並未增加，甚至有的地方降低，如二〇一〇年臺北市比上一年減5.44人（每十萬人），臺灣人的古意與吞忍也許寧可自殺不願犯罪，我不敢斷言。但臺灣人的德天命、守王法，是自省外來統治者以來的宿命文化。連政治性的遊行，都

像嘉年華會一樣的和乎。

其次，誰都知養育子女的負擔與艱辛，臺灣會嚴重到世界第一嗎？不生的女權主義，臺灣會高過歐美嗎？哀莫大於心死，對個人、家庭、臺灣前途的茫然，恐才是臺灣人不生的重要因素，全世界只有臺灣才有國家地位的不確定性，一個人口比澳大利亞國家還多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上，居然沒有國家的尊嚴？自己、自己的子孫，不知要生在何？不知要過著怎樣的生活？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又何必生呢？

再次，是臺灣人深層性格的問題，雖然臺灣意識大幅提升，臺灣人的認同已達七成，但對人際的感性與政治的冷感是臺灣民主政治不能盡其全功的最大阻力。亦即缺乏我一向主張的臺灣人的「理性精神」與「公民意識」，理性必須擺脫感性、感情，臺灣做事多憑感情，靠面子。而理性也必須排除神權、迷信，臺灣人逢神必跪逢廟必拜。金錢累積感情，功利推動信仰。而且長期缺乏公民社會的理念與經驗，多不知參與公共事務、捍衛社會公我。臺灣人有投票的政治權利，但每每為私情私利，而出賣公我而不自知。有多少貪汙、賄選者被判當選無效，但臺灣人仍然又選他或又選他的妻與子。最後選民自己要承擔政治敗壞的痛苦，寧可自殺，而不敢反對威權，不敢挑戰命運，這就是宿命性格鑄造的宿命文化。

四 民間信仰與臺灣宿命

臺灣人的宿命性格，是在三、四百年被外來殖民統治下，吸取以閩客為主的漢式民間信仰所形成的。

臺灣原住民族——南島語系，原是泛神與祖靈崇拜，其中西部平埔族，開始閩客化，接漢字儒教文化，與融合佛、道等民間信仰，只殘存阿立祖或地基主的平埔族信仰。今臺灣人85%具有南島民族血統（林媽利二〇一〇），但但幾乎完全喪失原住民信仰與文化。臺灣缺乏本土產生的信仰，是主體性難建構的主因。

臺灣傳統民間信仰，是神明為中心，最多是媽祖與王爺的兩個神祇。與中國漢傳佛教不同，也與道教所有不同，只是混入道教神明與若干經典。基本上是一多神崇拜，富有巫術禁忌，功利導向，缺乏宗教的理論，然而卻臺灣人，H010人的生活寄託的會師。從日本至中國國民黨時代，佛教是官方、日人、外省人擁有的資源（證嚴屬印順弟子）臺灣人難插手。其後，有了選舉，這些民間信仰的廟宇，成為臺灣人聚集選票的票倉與香油的錢莊。地方黑道、角頭，掌握了廟宇，成了地方民代甚至行政首長，以後還可以做到中央民代，廟宇成為漂白的聖殿。到了二〇〇〇年大選後，政黨對決激烈，廟宇行情看漲，愈蓋愈多（一九九八年九千三百七十五間；二〇〇九年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六間）而活動也愈辦愈大。二〇一一年大甲媽遶境有一百二十萬參與八天七夜的活動。總統、院長、地方官員，轎頭群眾學生排長隊鑽轎腳，衛星電視SNG，臺灣民間信仰淪為政治商業行為。

同時以文創、國際化為名，炒作「電音三太子」，製作〈保庇〉的流行舞曲。媽祖遶境的表演遊行，中國胡錦濤主席還親自接見「三太子」。我慨歎主流政治勢力所主宰的臺灣民間信仰，更為臺灣人愚昧、無知的宿命文化悲傷。